

## 序言

查道炯\*

美国在处理全球海洋事务时，至少是从1898年它第一次出征海外开始，一直都秉持“凡是人类有能力到达的海域，美国都有使用权；无论谁与谁之间的涉海纠纷，美国都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姿态。这是为什么？

的确，从地缘地理这一国际政治研究所倚重的基本因子看，美国在全球的地理位置优越性是得天独厚、举世无双的。仅从水域的利用这个角度看，经过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建设，利用船闸、运河、南部和东部海岸的有利物理特征，美国本土形成长达4800公里的海湾沿岸航道及大西洋沿岸航道。这些航道连通五大湖、38个内陆州河港及密西西比河，实现了内陆物产和人流的通江达海。得益于这些水道的覆盖，美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片农田。面对大西洋的美国海岸所拥有的货运港口数量超过了西半球其余地区港口数的总和。大陆美国的东西两面无边的大洋是阻挡来自亚洲或欧洲强国力量冲击的天然屏障；在美国南边，沙漠将它与墨西哥分开；同时在其北面湖泊和森林将加拿大的人口中心与美国分开。这些资源禀赋使得美国在资本创造、粮食积余和国防天然屏障方面都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具有大幅度的优势。因此，有一种说法，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的重要性并不来自他们是谁，而是来自他们所居住的国度。

---

\*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海洋研究院教授。

如果看不出它是出于维持生存的需求和进行自卫的本能，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将其海权思维和具体政策偏好延伸到海外，遍布全球所有的角落呢？

在国际问题对话的场合，比较典型的美式回答，一是它有能力，二是它有需求。

在人与人之间，出现类似“把天聊死”的情形时，至少有走开的选择。

在国与国之间，正因为亿万年前形成的海洋是全球相通的，也因为不可能有将国家从海边搬走的选择，不论是作为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还是面对具体的、拥戴美式海权思维的人，人们可以维持情感层面的保留，但就是不存在不与美国在涉海事务打交道的选择。此外，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没有执行美国行政和立法当局在涉及海洋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任务，但是，它们违背这些思维而行事的选项也是不存在的。因此，了解美国海权思维的逻辑建构，对维护自身利益、避免冲突、找到尽可能广阔的合作空间而言，大有裨益。

我开始接触美国与亚洲的海洋事务这个话题，还是在1991年秋天。紧邻夏威夷大学校园的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一次午餐学术交流沙龙上，有研究生在分享他们对南海的渔业资源管理的观察。记得我是由于指出了开场发言人之一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习惯性英文表述弄颠倒了而被研究项目的指导老师注意到的。后来，我受邀参加了这个亚洲海域资源管理研究课题。课题组在1997年出版了它所描绘的南海沿岸各国实现资源共享的蓝图，但该书仅仅在几份专业程度较高的学术刊物中得到评介。事实上，在我们这些课题组的同学们忙着比对不同信息来源的资料时，绝大多数以国际事务和亚洲研究为专业的同学们都善意地提醒有无数更合时宜的话题可做。不过，回过头来看，不论某个话题在时局中的冷热变化，研究机构的知识储备工作都不间断，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知识服务精神。

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海洋作为一个话题的热度受国家间外交斗争形势的变化影响的程度比较深。从受关注的地理范围上看，与中国的海岸直接相连的东海和南海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例如，尽管中国和其它几个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一起在2013年获得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地位，北极事务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所受到重视的程度集中在极少数专门性研究单位和个人那里；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几乎不可能上升到类似美国关心东海和南海的程度。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基于我国数百年来处理涉海事务的传统。

在2011年东盟地区外长论坛把南海作为公开讨论议题之一，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所有权进行所谓的“国有化”之后，海洋权益研究在我国国际问题高等教育界开始成了一种时尚。不少入门学子抱有一种认知：是美国的亚洲和对华政策出现了转向，才使中国与东海、南海主权申索国之间的长期矛盾，又一次沉渣泛起；毕竟，作为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的海洋问题政策取向没有变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外交中又一次出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局面。也就是说，“（他方）行动——（我方）反应”的思维模式影响比较明显。而在美国方面，从政府官员到智库学者，则偏向于强调美国立场中一以贯之的成分，劝告中方同事不要大惊小怪。

董汀的导师向我推荐她来做博士后研究时，部分由于经过数年的博弈，相关大国之间围绕东海、南海的权益主张的外交互动确立了一个新的模式（各方的具体政策立场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海洋话题的热度已经大大降低。虽然与东海、南海维权相关的研究不是我本人的专长，但我发现她在博士阶段所做的研究，正因为其切入点是努力去理解美国的亚太海权背后的逻辑建构，是我国的涉海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问题所需要的；博士后项目应该支持这种取向的研究。

其实，即便是本着谋求务实合作的精神处理与中国利益更贴切相关的涉海事务，例如，海洋渔业资源、海底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的开

发利用和保护，民用船舶、民用航空器的通行如何做到有序、安稳、环保，这些功能性领域合作，要想取得突破，还是绕不开各国（方）权利主张背后的逻辑。而且，在东亚和东南亚涉海空间的使用课题上，正由于美国在地理上相隔较远但在基础知识的积累方面却又比较有连贯性，美国因素的影响力就被放大了。这些美国因素，从具体体现内容看，是法律传统（知识）、地理知识、到水文气象资料；从资助和组织跨国交流的机构看，少不了美国的基金会、大型企业。但這些机构（是否）出资支持调研以及对各种交流所设置的种种框架，其基本思想性的指引，还是在美国的海权思维。我们有必要不间断地了解和析其背后的逻辑建构。

这就是为什么董汀对美国的亚太海权的研究努力值得推荐。授予董汀博士学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论文学术委员会将她的论文评为2017年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对董汀所提交的包括其博士论文在内的申请材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决定邀请她参与博雅博士后研究（全额资助）。本书是她入站以来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为董汀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很高兴地看到，入站以来，她在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亚太海权逻辑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涉足至今依然是冷门的涉海课题（海底通讯光缆、海洋塑料清理等）。类似的基础知识储备努力，正是我国学术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海洋话题所应该做的贡献。

2019年2月23日